

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。城南的张三和城北的李四见面,按照南京传统问候方式,李四就问张三:“你阿吃过了?”张三三面露微笑很客气地回答道:“我‘偏’过了。”李四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:“这偏过了是啥意思呢?”张三说的“偏”字,在老南京话里不仅有吃的意思,还有先一步吃的含义。可是城北的李四为啥就听不懂呢?原来,同是南京城,这城南和城北的方言还不太一样,而且,不仅说话不同,就连生活习惯也不大一样。这种城南城北“两重天”的有趣现象,不少南京人早就发现了,而且津津乐道,可是想要说清其中的门道,还真不是件容易事。

解码老城南的方言习俗

“到猫”和“扎烧鸡”到底指什么?

今年68岁的刘奎龙是地道的南京人,从小生活在城南的水西门一带,耳濡目染,讲得一口正宗的“南京白话”。退休后,每逢周末他就去甘家大院表演,常常是他话一出口,台下就笑声一片。

说起老城南话,刘奎龙张口就来,“筷儿、碟儿、碗儿、杯儿。”他说,“儿化音”是老城南话的一大特点,城北人的儿化音相对就要弱些。另外老南京人说话有个特点,说话时嘴巴是撇着的,形成“O”形,发“O”的音。“比如,正宗老城南人读大妈,发音接近‘到猫’,嘴巴都成“O”形。”刘奎龙说,在夫子庙一带,中华门东门西以及水西门一带的老街老巷子里,至今仍沿用这些说法。

“城南话还有不少特有的词汇,城北人也不晓得其中的意思。”刘奎龙说,比如“扎烧鸡”(音同)讲出来,谁会想到是“淘米箩”的意思呢?又有现在城北人口中的“聊天”,到了老城南口中就叫“刮白”。城北人正常说“你到哪儿去?”老城南话则说“你到那个落地(音同)去(读ki音)?”城北人说“逮到一只鸡。”在老城南人的嘴巴里就叫“捞到一只鸡。”

“下关人讲话又有点不同了。”刘奎龙说,城南人和下关人在一块对话,一听就知他是下关口音。例如城南人讲“下关”,“下”念成“xua”;城北人读“下”第四声,关读轻声;而下关人读“下关”,下是第二声,关是第四声。有个老早以前的儿歌就这么说道:“下关公安戴钢盔,一拖就拖一卡车,排队到江边去尿(sui)尿,一尿就尿一钢盔”。仅这首童谣里,读音就有很多不同,刘奎龙说,钢盔的“钢”城南人读降调,下关人读第二声。“车”的发音老城南话应该读“che(音同错),现在的南京人多读“che”,发第四声,而下关则发“chei”音。这区别有点大了。

掌握这些技巧,你也能说老南京话

在听完刘老所说的纯正老城南话后,带着好奇,记者向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张薇求证了此事。

张薇认为,如果按城区来分,城南的秦淮、白下、建邺三区的方言变化较慢,一向被视为老南京话的代表;而城北鼓楼、玄武二区受普通话影响较大,又受外地方言的影响,体现新南京话的特点;而下关区是在城门外的地区,以往苏北、安徽移民多,一般不视为南京话的代表。

那么究竟老城南话(老南

京话)有何特点,它和城北话又有什么区别呢?张薇说正如刘老所说,老城南话儿化现象较丰富,儿化使读音带上卷舌动作。

其次老城南话有an和ang不分,具体说来关和光不分,钢和干不分。“我从小住在老城南,小学是在鼓楼一带上的,上课时老师让我读课文,印象很深刻,‘一根钢铁巨柱’的‘钢’我读成‘gan’(同干音),结果全班哄堂大笑。”

此外,老城南读音不分的还有“i”和“ü”,“e”和“o”。所闹的笑话也就更多了。“吃鱼”读成“吃姨”,“下雨”读成“下以”等等。快乐的“乐”字在老城南人的口中也变了味,变成了“快落”(音同)。“jqx”和“zcs”不分,例如“姐姐”读起来就变成“ziezie”。

“现在多数南京人,连部分城南人都不这么读了。”不过张薇说,有些普通话里区别明显的发音,不少南京人还是分不清。例如“yin”和“ying”不分,“l”和“n”不分的还是大有人在。

“上面说的,是老城南话的主要几个特点,再有就是老城南话的词汇特点,也颇有意思。”张薇一一举例:像是“包芦”指玉米,“搓簸”指簸箕,“歹怪”指凑巧。形容钱很多,南京人会说话说“猫捞老”的。此外,老城南话还特别爱用后补成分来加深程度和语气。比如:“哈哈,你对我真好,好得一塌带一抹。”加在后面的“一塌带一抹”就是用来加深程度的。

张薇说,这样的例子在老城南话里不胜枚举。在《红楼梦》里,曹雪芹也写到过很多南京方言。典型的是第四十四回《变生不测凤姐泼醋,喜出望外平儿理妆》中,贾母骂贾琏的一段话:贾母骂道:“下流东西,灌了黄汤,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,倒打起老婆来了!”活脱脱的一个南京老太太骂晚辈的腔调。

南京话为啥“变了味”?

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老南京话“变了味”?带着疑惑,记者走访了不少“老南京”,希望从他们口中捕捉到蛛丝马迹。

“城南城北人说话不一样,那可跟他们不同的营生有很大关系。”刘奎龙给记者举起了例子。从民国开始,城北就是“文化人呆的地方”,当中不乏做官、教书者,说话已经很接近当时的“官话”普通话。而城南则是买卖人的聚集地,有卖小吃的、变戏法的、做手艺的以及拉黄包车的等等。他们说的地道方言,跟普通话就大不相同。

而家住老城南的居民秦冯志则把原因归结到了“交通”上。“城北有车站又有码头,交通发达,南来北往的人



刘奎龙在表演“南京白话”

多。”在与大量外地人的交流接触中,南京话的发音、用词自然受到了影响。这样一比,城南显得闭塞许多,“外地人来得不多,祖上传下来的老话也就保留了原貌。”

听完了老城南人们的观点,记者再来到城北,听听这里老人们的意见。在家住下关的吴菊仙老人眼中,老南京话之所以“变味”,还得追溯到清末淮河发大水的时候。“那时候在光绪和宣统的时候,淮河先后发了两场大水,许多淮安地方的人逃难到了南京。现在下关这一带,不少人祖上就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
而从小在宁海路长大的蔡国荣老人则认为,南京遭遇历次屠城,原住民锐减,这才是老方言“变味”的关键原因。

这几种流传在民间的说法,到底哪种比较靠谱?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位学者。

内桥把南京城分成一老一新两半

“其实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。但不管是历次战乱、清末水患还是交通差异这些因素,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:大半个世纪以来,南京人口发生了剧烈变动,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迁徙到了南京。”由于城南人口已趋于饱和,这些“新移民”就在当时颇为荒凉的城北一带定居下来。这里面既有逃难的百姓,也有北下的生意人。比如说下关那一带紧靠淮河,在那里安家的大多是顺流搬来的安徽、苏北地区的渔民和商人。他们的后裔,说起南京话来,就带着淮安味儿。上文我们提到“下关公安戴钢盔”的童谣,就正体现着

淮安话的方言特点。

对于这位学者的说法,民俗专家王涌坚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。“南京地区受新移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鼓楼。南京在民国时期是首都,鼓楼也就由原先的荒地被开发成‘新城区’。”这包括了三个部分:现在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一带的“教育区”,宁海路一带的“使馆区”以及白下区一带的“文化区”。在“新城区”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,其中不乏官员、家属、使节或知识分子。大家基本上来自外地,交流起来自然以“官话”普通话为准。

于是,以当时的内桥为分界线,城市的南北两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景:北面高楼林立,人们或穿西服,或着中山装,拎着“洋派”的公文包讨论着国家大事;南面则是一派热闹的市井场面。大街上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小店小摊儿,人们大多穿着对襟大褂,怡然自得地闲逛着。叫卖声、砍价声此起彼伏。

由于真正的老南京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一带,因此这一带不仅保留了地道的南京方言,相对于城北(包括下关)来说,也保留了地道的南京民俗。

在下关居民眼里,老城南过日子很讲究

说起老南京的习俗,家住下关安怀村的华敏贞老太太深有体会:“老城南,过日子可讲究了!”何出此言?原来,华奶奶老家是安徽的。50年前,还是小姑娘的她随亲戚在下关落脚。初来乍到,南京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新鲜有趣。安顿下来没多久,就碰到了第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日子,

“那天一大早去买菜,我发现周围邻居,几乎人人都在买老母鸡,人手一大块豆腐。”为啥家家户户都要吃豆腐?隔壁住的王大婶随口抛出一句谚语:“若要富,冬至吃块热豆腐。”原来按照从老城南传出来的老规矩,家家户户在冬至这天都会吃热豆腐,寓意大富大贵。这些对于当时的华奶奶来说,非常新奇:“在我们老家,冬至这天没啥讲究,都是随便就过去了。”之后的日子里,华奶奶还发现南京还有很多老民俗,是他们家乡所没有的,“比如就说三月三要吃荠菜花炒鸡蛋,据说是吃了不头晕能明目。”

在华奶奶家周围的街坊,不少是半个世纪前从苏北、皖北等地搬到南京来的。大家在入乡随俗的同时,也保留下不少老家的生活习惯。跟正宗的老城南相比,光是“吃”这一点,就不尽相同。“比如说老城南吃东西比较讲究,早饭爱吃小笼包、干丝;平常爱吃甜食,什么酒酿元宵、糖芋苗。尤其是南京人爱吃野菜。我们这边人就不在意这些,面食是我们更爱吃的。”

讲究到啥程度?门上挂葱也有说道

记者找到一位正宗“老城南”——在宝塔山一带住了60多年的窦喜康老人。刚踏进窦老家,记者就发现一件“怪事”:一把粗壮的葱,被红纸层层包住,稳稳地悬挂在大门内侧。葱挂大门,是要干啥用?窦老一听,不由得笑了:“到我家的客人,没有不问的。”他赶紧给记者解释说,大门内挂葱,一是取“一清二白”之意;如果家里有小孩,则还有祈祷孩子“聪明伶俐”的意思。而这葱,也不是随便一挂拉倒,必须用正红色的纸,包裹好了再挂。

“到现在,我们老城南的一些习俗,不光是城北人,就连年轻的城南人都不知道呢。”窦老不无遗憾地表示,有不少风俗濒临消失。“就吃年夜饭来说吧。老城南会在大年夜烧两条鱼,一条当晚吃,另一条留到小年夜,也就是元宵节那天吃。寓意‘年年有余’。”万一有人不记得误吃了,一家人都会不高兴。

窦老还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举了“哭嫁”的例子。“所谓‘哭嫁’,要哭得越厉害越好。”过去老城南结婚,不单是新娘子,连同母亲、姊妹和嫂子,都要大哭一场。俗话说,女儿出嫁时没有“哭嫁”,将来会生哑巴孩子。而妈妈“哭嫁”时念叨得越多,将来女儿生的孩子就越伶俐。

有意思的是,窦老告诉我们,因为祖上流传下的讲究和风俗太多,不少老城南人家,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,常会发生

遗漏、犯忌的情况。后来有人想出对策:索性在家里挂上红联,上书“太公在此,百无禁忌”的红联,就此不再担心犯忌。

而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,新一代的城南人对祖辈的老传统也不“感冒”。刚过而立之年的市民顾先生,从小在城南长大。“城南人结婚时讲究‘哭嫁’,大年夜讲究鞋头朝里放,平常还爱吃‘八鲜’。而我接触的城北人,基本上都没这习惯。”而当记者进一步追问,诸如“哭嫁”、“五黄”等到底有哪些讲究时,顾先生却耸耸肩:“其实我只是听老人家提到过,知道有这回事。可具体指什么,我还真不清楚。”

演变正在悄悄进行

和顾先生一样,他周围的年轻人也离老习俗越来越远了,在他们眼里,老习俗和老语言成了落后的代名词,他们中的很多人,早已走出城南开始在别处购置房产,而且,为了便于和外来的“移民”交流,他们基本上都讲一口“南普”。

张薇告诉记者,这种现象和语言学家的调查完全吻合。赵元任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南京方言进行调查;鲍明炜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次进行调查;得出的结论是——南京话正在迅速向普通话靠拢。

不过张薇同时也提出,虽然这多数新一代的南京人说的是南普话,但是不管如何演变,南京话在音调上始终保留着鲜明的特色。“这主要体现在,一是比普通话多了人声,即很多字发音短促。从音调的不同,依然可以迅速辨别出南京话。”

另外,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,城南城北语音的差异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已经不再明显,反倒是年龄之间的差别凸显出来。在专家的指引下,记者找到了《南京方言词典》这本书。书中的《引论》中这样介绍道:按照年龄区分,南京话能分四派。“最老派”是城南80岁以上老者的方言,现在使用人数很少,被公认为南京话的代表;城北除了自城南迁来的,基本没有最老派。“老派”指的是55岁到80岁之间的城南方言,这一派被认为是不标准或已走样的老南京话,内部差别较大,同一个人的发音用词也不稳定,时旧时新。城北只有部分老年人使用老派方言。“新派”主要是25岁到55岁之间的城南人方言,内部差别也很大,城北多数中老年人接近这一派。“最新派”是25岁以下的城南人方言,内部差别不大。城北中年以下及外来居民改说南京话也接近这一派,中小生基本通行这种口音。